

·二十世纪论评·

难以告别的20世纪

——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几个主要问题

刘德斌

内容提要 本文以递进的方式,讨论了战争、民族冲突、现代化与全球化、冷战意识、全球文化认同等五个问题;指出虽然世纪之交已经来临,但我们仍将生活在20世纪的氛围里,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20世纪留给我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全球文化认同的形成;而只有这种全球文化认同的形成才能够真正把我们带进一个新世纪。

关键词 20世纪 战争 民族冲突 现代化与全球化 冷战意识 全球文化认同

20世纪即将成为过去。在告别这个让人类经历了无数破坏与重建、反动与进步、停滞与变革的世纪之时,我们发现自己的心态十分矛盾、复杂。我们既想让那些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20世纪的天灾人祸留给我们的痛苦回忆随着这个世纪的终结而消失,又沉湎于我们在这个世纪里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既想讴歌人类在20世纪的艰苦卓绝与坚韧不屈,树立起面对新世纪的信心和勇气,又担心那些在20世纪曾给我们带来无穷灾难的“祸根”在21世纪重新开花结果;我们既对新的世纪充满了好奇与憧憬,希冀人类的一切都会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美好,却又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躯体,谁也不可能随着世纪的转换而把自己一分为二,把聪明带到明天,把愚昧留给过去,……这一切都说明虽然世纪之交已经来临,20世纪仍是我们难以割舍、难以忘怀、难以告别的世纪。

对比以往,20世纪的确非同寻常:它不是19世纪的简单延续,而是近代以来人类几个世纪历史演变的积聚。我们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摆脱20世纪的影响。当21世纪到来时,乃至21世纪前期,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许多20世纪留给我们的问题,同时又奋斗在20世纪所开辟的事业里。

一、战 争

战争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不同群体之间最常见的竞争方式,也是人类摧残自身最残酷、最有效的手段。近代以来,借助于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战争的水平不断提高。战争机器最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东征西讨,使东方各民族屈服于它们所发明的坚船利炮之下,西方由此成为世界的主宰。进入20世纪,战争的水平进一步升级,战场从陆地、海洋扩展到天空,从欧美、远东扩展到全世界。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20世纪战争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比以往所有世纪战争损失总和还要多出许多倍。可以说20世纪代表着人类有史以来战争手段、战争方式、战争规模乃至战争艺术的最高水平和集大成者。

· 1 ·

20世纪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战祸最为惨烈的一个世纪。这句话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来说,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份量和含义。因为战争似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的前半期;二战之后人类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里;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人们普遍相信,二战之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已使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中摆脱出来;而苏联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不但最后消除了世界大战的危险,而且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扫清了道路。这是一种乐观的预想,也是一种善良的希冀。但1999年春天的科索沃战争,使人们对这种预想和希冀产生了怀疑。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开始对北约以外的南斯拉夫联盟大打出手时,人们发现,战火随时都会在我们周围燃起。过去那种人们只有在战争片的画面中才能“欣赏”到的炮火纷飞的场面,现在通过自家电视的荧光屏就可以看得到了。电视上的画面比电影中的画面更真实,但不如电影画面那样精彩,更没有战争故事片中的那种浪漫和离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熊熊大火和断壁残垣中、在阿族人和塞族人流离失所的道路上、在中国驻南记者生死瞬间的遭遇里,人们在一个被称为和平的年代再一次领略到了什么是战争,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实际上,如果我们正视90年代以来的世界现实,就会发现,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地区冲突、局部战争的危险却增加了。由于其发生在欧洲,又与美俄等欧美大国的战略利益直接牵扯在一起,所以科索沃战争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环顾世界,在欧洲以外,在非洲,在中东、在南亚,在俄罗斯,冷战结束之后所燃起的战火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息下来。从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大规模种族仇杀,到伊拉克的地区霸权主义,从车臣持续不断的武装叛乱,到印巴在克什米尔再度交手,90年代世界各地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就有20多起。战争,这个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无穷灾难的怪物,无疑将伴随我们进入21世纪。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世纪之交非要让战争与我们同行呢?首先,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仍把军事力量作为巩固其世界霸权,推行其“领导”意志的手段和工具。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苏联垮台之后仍然致力于军事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为此不惜违反1972年与苏联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投巨资开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地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实际上是在变相恢复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美国的目标是要在21世纪对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其盟国,构成一种新的战略优势。很明显,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同时都能与美国对垒。但美国的挑战无疑正在把人类的战争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大国之间潜在的军备竞赛带人一个新的领域。大国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失。第二,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被认为是21世纪新式战争的预演。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动用的高技术武器令全世界“大开眼界”,同时也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以及由此可能面临的威胁。更新军备成为多数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冷战结束并没有导致全球性裁军,相反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一轮新的、心照不宣的军备竞赛。军火市场异常活跃。按照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最新统计,1998年的军火交易仍在560亿美元以上。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武器都是军火市场上的抢手货。人们似乎都在为未来准备着。与此同时,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还使人们对未来战争的“真谛”有了一点了解:即凭借高技术武器,特别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可以在人员伤亡极小甚至无伤亡

的情况下达到战争的目的。西方国家在 21 世纪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因而大大增加了。科索沃式战争，即联合起来的北约国家利用军事手段干预北约以外国家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战争的一种主要模式。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装集团，实际上正在向世界警察部队的方向发展。第三，冷战后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几乎都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有关。在东西方两极对抗的全球性矛盾消除之后，局部的、区域性的、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似乎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出来，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的焦点和 21 世纪局部战争的主要根源。

二、民族冲突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民族运动蓬勃高涨的世纪。其突出标志是一战、二战和冷战后的民族运动高潮。一战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芬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获得了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实现了民族夙愿，成了新兴民族国家。在主张民族平等和自决方面，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有相同的一面。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公开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列宁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二版，第 123 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迅速发布了《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颁布法令承认芬兰独立，废除俄、德、奥瓜分波兰的所有条约，并率先承认波兰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民族自决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威尔逊则把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带到了欧洲。在他的坚持下，国联把诸多社会和人道主义条款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写进了盟约，并在欧洲建立起历史上相对合理的国际边界。二战之后的 50 至 60 年代，更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有 60 多个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由新兴民族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在制约美国及苏联的霸权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冷战结束后第三次民族运动浪潮的到来，却出乎许多人的预料。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当西方正在为苏东社会主义的政权垮台和冷战终结而庆幸之时，一股新的民族主义呼声却从世界的不同角落响起。或许在苏联一分为十五、南联盟一分为五的解体中受到了鼓舞，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直接以民族分治、分立、分离甚至独立为诉求，给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黑三方旷日持久的血腥冲突，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你死我活的种族仇杀，似乎让历史倒退了几个世纪。有人为此惊呼：“世界很有可能面临一个内战的世纪”。

“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从氏族、部落、城邦国家和帝国等演化而来，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最早产生于西欧，它往往和现代意义上国家（State）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事实上，“民族”与“国家”互为表里的统一，只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东欧、亚洲和其他地区民族的产生与国家的形成并不同步，因而形成的多为多民族国家。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则是西方殖民列强根据自己的实力、利益和意志套上去的。直到二战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的许多族群还生活在氏族和部落阶段，但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被西方殖民者分割完毕，相同的氏族、部族和民族被人为地割裂在不同的区域。50 - 60

年代非洲民族国家的独立仍是以这种分割为基础。因而在非洲的地图上出现了以经纬线划分的几何状“奇景”。但是，当今流行的民族理论和国家观，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力”，却是建立在西欧“民族国家”的模式基础之上的。这就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生了冲突。冷战后全球性的民族分立主义既是西方“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误导和激励的结果，也是封闭、狭隘和排他的民族情绪鼓舞的必然。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国家往往还以人权为借口，干预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民族纠纷。这无疑将发展中的多民族国家置于一个更为困难的境地。民族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纷争无疑将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三、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20 世纪也是一个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的世纪。90 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拓展和交通与通讯手段的革命性变革，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即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有人断言：全球化不但将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

全球化的“阶段性实现”（因为它和现代化一样，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无疑将是人类文明的一场革命性变革。但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人类必须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and 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归结为一点，可以概括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关于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多有争议。但如果循着历史的线索去考察，我们会发现，全球化与现代化实际上是同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的历史过程。如果说现代化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并延及整个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各领域的历史变革，那么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就是以各国各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深化。问题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因而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含义。现代化的进程启始于西欧。它先是打破了欧亚大陆各古典文明的均衡发展状态，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就把世界划分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两部分，并迫使不发达的非西方国家改变自己的传统，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轨道。因而，整个 20 世纪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觉醒、选择和追赶的世纪。现代化的压力是许多国家动荡不宁、内乱频仍、变革剧烈的主要根源。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现代化的努力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而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使已经处于现代化压力之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面临这样一种形势：它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经济实力根本无力左右世界经济，但却难免受到全球性经济波动的冲击，并由此引发现代化压力之下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导致新的动荡与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动荡。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及其冲击之下印度尼西亚的骚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将是一个更为艰险、更难把握的复杂进程。

如果东亚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如果印度尼西亚那样的骚乱蔓延到所有发展中国家，那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但在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化的 21 世纪，却完全有可能发生。全球化的本质和趋势应该是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无限扩

展，直至超越所有民族国家而确立起对全世界的支配地位。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面临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它们在占有对发展中国家更大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发达国家积极的合作与负责任的政策将是它们化险为夷的前提。如何把握全球化，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四、冷战意识

20世纪还将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竞争和冲突而载入史册。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突破，并且对20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改变了近代以来的国际战略格局，给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第二，苏联实力的不断增长，为击败德意日法西斯准备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人所共知，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的殊死抵抗，美英法等希特勒所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要遭受更为惨重的打击，战争就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有过这样一段话：“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

80年代末90年代初，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冷战最后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而告结束。西方许多学者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并已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结论。但是，欧洲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随着苏联的垮台而倒闭。相反，他们却通过改革开放，通过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其中尤以中国的业绩最为突出。中国经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令全世界感叹、惊奇，以致于苏联垮台之后一部分人鼓吹的“中国崩溃论”的尘埃没等散去，“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就被鼓吹起来了。中国也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前苏联，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右翼势力攻击、遏制的主要对象。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和媒体在人权、贸易、知识产权、台湾、香港和西藏等一系列问题上为难中国，同时还制造出“政治献金案”、“李文和间谍案”和“贩卖人体器官案”等一系列丑闻诋毁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了严重的歪曲，中美关系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历史进步，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比近三十年前中美关系改善之时，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最根本的是，中国人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事实上，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里，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开始以来，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美之间，或者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早已经超越了原来人们设想的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境界，形成了一种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右翼势力顽固地与中国为敌呢？归根结底，还是根深蒂固的冷战意识和冷战思维在作祟。冷战的突出特点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冷战归根结底还是一场欧美传统的大国霸权之争。意识形态最终只是充当了苏联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仍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对手，而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科索沃战争和北约东扩等一系列事实表明，美俄之间实际上仍处于一种“冷战”状态。只不过俄罗斯的力量已经今非

昔比，美俄之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战略平衡。因此，所谓的冷战意识，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分歧所造成的结果，而实际上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为表象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其主要对手的竞争和对抗意识。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早已经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计较意识形态分歧。但中国的崛起被别国视为潜在而重大的战略威胁。仅此一点就使围绕中国的冷战意识和冷战思维在 21 世纪仍将继续下去，除非在全球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美国领导人能够认同中国的国情和选择，焕发出一种新的政治智慧。

五、全球文化认同

以上四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一种全球软环境的建立：这就是基于全球化不断加深基础上的全球文化认同氛围的形成。

90 年代初，伴随着“全球化”热兴起的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传播。前者强调的是全球性的同一和融合，后者突出的是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亨氏理论遭到了许多人的抨击，甚至有西方学者对他的“冲突论”嗤之以鼻，认为他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冷战时期，他本人仍然沉湎在他冷战期间的辉煌岁月里。但是，亨廷顿的“冲突论”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之际从反的方面提出了不同文明、文化之间沟通的重要意义。

随着一个物质生产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已经开始。而且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许多产品已经难以用传统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标准来划分了。如我们从电脑网络上购得的书籍或 VCD 片，既是文化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利用因特网购物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正在兴起的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全球文化认同指的不仅仅是对网上购物方式的认同，不仅仅是对目前网上所传信息方式的认同，因为全世界目前能够上网并在网上购物的不超过 2 亿 6 千万人。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他原来的氛围里。所谓的“全球文化认同”指的是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在对一种不断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全球性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认同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所固有的生活习俗与价值标准的理解和宽容。惟有如此，最为有别于人类历史上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全球化时代特有的优势，即集中化与分散化统一，国际化与本土化统一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出来，全球化的进程才能持续下去。

现代化曾以分裂世界开始，全球化将以整合世界告终。我们拥抱全球化的目的不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增加我们的物质财富，而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一次机遇，一次让人类消除已有的狭隘和偏见，愚昧与教条，从战争和民族冲突的怪圈儿中摆脱出来，从南北分裂和非此即彼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最终告别 20 世纪的机遇，一次迎来一个美好的新世纪的机遇。

刘德斌 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长春市 130012